

上海解放70周年 1949-2019 找到你

“在那里度过的美好童年,给了我一生积极阳光的养分”

瞧,这是托儿所里穿军装的你

■本报记者 车佳楠

1951年11月8日,上海襄阳南路207号的洋房里传来阵阵笑声。洋房里,一群四五岁模样的小朋友穿着军装,拿着木质的玩具枪,半蹲在地板上,表现战士在前线英勇作战的情形,逗乐了现场的越南人民访华代表团。表演结束后,小朋友与外宾在洋房前合影留念。当时,这栋洋房用于民主妇联托儿所做校舍,解放日报摄影记者董为焜端起相机,记录了这珍贵的画面。曾经的小朋友,如今74岁的王胜利说:“在那里度过的美好童年,给了我一生积极阳光的养分。”

民主妇联托儿所在哪

上海解放时,家庭妇女有近100万人。然而当时整个上海只有约51个托儿所,收托儿童仅2000余名。工作还是养育小孩?成为摆在百万妇女面前的难题。1949年7月,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后,便立即着手推动创办各种层次、各种类型的哺乳室、托儿所和幼儿园。

1949年年末,《解放日报》一则公告介绍:民主妇联保育院(托儿所)于襄阳南路207号开班。这个地址,如今仍然是一所幼儿教育机构——襄阳南路第一幼儿园的所在地,老照片中的洋房还在!

我来到襄一幼儿园。照片上的草坪已被替换为柔软的绿色塑胶垫,多了新式的活动设备。东面的部分草坪已经成了拔地而起的居民楼。洋房前多了两棵高大的白玉兰。现任园长马瑛说,因为生源增加,校舍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行了扩建,不过老洋房的格局还维持着原来的格局。照片中昔日小朋友表演的房间,有一扇圆拱大门。我们按图索骥,终于确定是位于洋房进门右手边,如今中五班上课的教室。这是洋房里最大的一个活动空间。

记者查阅史料看到,上海解放后托育事业飞速发展,至1957年底,工厂托儿所从解放前的29所发展到820所,收托儿童达到3.6万人;里弄托儿所则有3331所之多,收



如今,民主妇联托儿所待过的襄阳南路207号是襄阳南路第一幼儿园。 本报见习记者 沈阳 摄



当年托儿所的孩子们扛着工具,拎着竹篮,出发去菜地劳动。 资料照片

托儿童人数达到了12.7万。机关社团托儿所也从两所发展到了56所。“当时很多工厂辟出了闲置地用于开设托儿所,抽调厂里的精英去管理,对孩子们都很好。”襄一幼儿园园长王热情高涨。

既需“教”又需“养”

1959年一个夏日清早,19岁的王玉华从上海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毕业,去工作的幼儿园报到时,“进来就看见,一个老师提着一个铅桶,一块毛巾,一瓶白色的炉甘石药膏。小朋友看到我就像阿姨。”

上个世纪50年代初,很少有保育人员受到专业培训,大部分都是带着孩子经验的阿姨来照顾。一名幼师专业老师既需“教”,又需“养”。

每天6时30分,王玉华到卧室挨个叫醒孩子起床穿衣服、吃饭、上课、户外活动,她与保育员一起出动,到12时30分小朋友午睡了,下午班老师来接手。下午课外活动结束后,王玉华又要帮小朋友洗漱;天冷的时候,还要

找个“汤婆子”,一个个推到被子里去热被褥。晚上则轮流巡视孩子睡觉,同时学着缝补破洞袜子,打打补丁。到晚上8时30分,晚班老师前来接班。

除了体力活,王玉华还需要抽时间备课。“语文、常识、音乐、体育……”她记得,“上音乐课时,我在弹琴,背对着小朋友坐着,小朋友常常给你‘下马威’,吵翻天!不得不让有经验的保育员坐在旁边压阵。”

和新中国的上海一起长大

1948年4月,华东保育院在山东潍坊青州初创。魏晓路回忆起自己的母亲、华东保育院第一任院长李静一曾面对的困境,不禁感叹:“当时的环境实在太残酷了!孩子要吃奶怎么办?我妈妈她们到处去找羊奶,一家一家地问,不够喝还要翻山越岭去邻村,每天来回二十几公里,终于解决幼小孩子喂奶的问题。”

1949年5月27日,上海解放。6月21日,华东保育院的184名师生坐了三天三夜火车抵达上海,孩子们的生活条件逐渐有了改善。

“上海刚解放,我们就过来了,我们真的是和上海一起成长起来的。实际上,从革命根据地来的这些保育院,积累了许多因地制宜、灵活办学的方法,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幼儿教育事业提供了很多经验。”74岁的王胜利告诉记者,她就是当时184名师生中的成员之一。在革命根据地时期,孩子们知道一切来之不易,被带到田野里参观劳动人民劳作,鼓励做一些适合于身体的劳动,比如帮助老乡捡麦穗。这样的“传统”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。

在解放日报摄影部的资料库里,记录着一张张童真的笑脸;当时托儿所的儿童游乐设施是一艘木质小船,体育活动的内容是搬花盆。一个人搬不动,找其他小朋友搭把手;手工活动的内容是玩泥巴、捏泥人;上课外体验活动,需要全副武装,扛着锄头,拎着竹篮,上菜地去。他们时而调皮时而认真,让人忍俊不禁。

转眼间,当年的“小朋友”王胜利已双鬓渐白;“无论经历了什么,一个人如果拥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,那么他的一生基本上是积极阳光的。”

解放论坛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给基层一根怎样的“松紧带”

舒抒

上海举全市之力开启了生活垃圾分类法治化进程,不仅全国人民都在看,甚至引发世界关注。这一情形下,上海从基层干部到普通民众,都源源不断地展现出一股令人钦佩的热情。人们很明白:垃圾分类是场需要持之以恒、久久为功的攻坚战。

不过,城市治理进程中,并非所有事都像垃圾分类一样,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法治保障。有时候,缺乏明确的预期和指向,又没有硬性的抓手,一些分量不轻的工作到了基层干部手中,往往会变成“夹生饭”。他们既把握不好尺度,也吃不准深度,常常进退两难。

比如对同一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要求,市区和郊区的考评标准相同,面对“寸土寸金”的市区干部,要完成足够大的面积指标发愁,而“地广人稀”的郊区干部则要成为“xx分钟到达率”“xx人数覆盖率”而苦恼。有的指标范围往往以“参考意见”的面目出现,看似没有明确约束,但“参考意见”又不能不“参考”,干部们只好在“目标”和“实际”之间反复纠结,悄然消磨精力与意志力。有时,同样的工作,却有来自不同部门的考核标准,而考核指标的权重又不一致,使得基层无所适从。

有时候,自上而下的指令还常常临时生变,有的不同渠道口径不一,有的则因前期研判不足,同实际情况存在落差,这就更让基层干部感到为难。他们常常要在“上级指令”和“自身经验”间反复周旋,甚至要靠“猜测”上级意图来办事,一件小事往往变得无法抉择。而这样的后果,还有一个“副产品”——自我加压。

在基层,有一种观念颇为流行:“搞不清最终目标是什么,先抢个‘最大’‘最高’‘首发’的名号没错,还能在领导面前‘有姓名’。”这种“抢着干”,正是一种变异的“自我加压”。更多时候,因上级意图含糊带来的基层自我加压,还存在“层层加码”的因素——不知道你要什么,那就多做一些选择供你挑吧。于是乎,原本做一件事,便会被演化成为N件事,其效能高低,是可想而知的。

政策、指令自上而下,不可能事无巨细、把一切都设计好、规定死。很多时候,基层也需要一定的弹性空间,以便自主创新。这就像一根松紧带,适当范围内张弛有度,会更切合实际,执行起来也会从容不迫。

但任何一条松紧带,都需要对应一个合适的“腰围”。基层的这个“腰围”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给出的导向和预期是清晰还是模糊,是明确还是随意。显然,上层不应有太多的弹性空间,不然基层要面对的就是“漫无边际”,是负担无限增加、“腰围”无限膨胀。“腰围”撑到一定程度,再有韧性的“松紧带”总有松垮的一天,再也回不到起初的劲道。

同抓发展相似,基层工作,也需要“定力”。基层干部们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,每天对自己东奔西跑之事全无知。除了考核时增加的分,汇报时喊出的口号、报出的百分比,更应该知悉自己所做之事在实践中究竟有无效果,是不满足于百姓、企业所需,跟现实到底有无脱节……做到这些,才称得上“实干”。若是要围着不时反复的指令团团转,或是不停地“揣测意图”、层层加压,干部们怎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沉下心来、自我修炼、自我约束、自我提升?

而基层干部的定力,很大程度上来自上层指令的“基准”,给出一根适宜基层的“松紧带”,必须有清晰的定位、明确的指向;在其背后蕴含的,则一定有科学、务实的决策机制,有效的激励机制,以及特别重要的——在各个层级上对一切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坚决杜绝。在这样的前提下,基层才能更好地发挥创造性,“松紧带”才能伸缩自如。

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

“金牌老娘舅”顾仁良扎根小镇,“越干越欢”,三年成功调处172件矛盾纠纷

“我说的是法,讲的是理,用的是情”

新时代奋斗者

■本报记者 黄勇娣

“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”顾仁良每天要调处七八起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。自2014年退休,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调解员,几年来老顾“越干越欢”,仅最近三年就成功调处了172件矛盾纠纷,涉及金额达1400多万元,为维护一方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,而他自己也成了金山区亭林镇上的“金牌老娘舅”。

其中秘诀,老顾说得很简单——“我说的是法,讲的是理,用的是情!”

融合“法理情”,是最有效的办法

在退休前,老顾在企业、村里、居委会都做过党支部书记。在基层工作40多年,老顾耐心、热情、口才好,善于调解矛盾纠纷的名声越传越响。2014年3月,刚退休不久的老顾成为了人民调解窗口的首席调解员。“作为一名专业调解员,首先要讲究一个‘法’字,同时要坚持‘法、理、情’融合,这样才能让人心服口服。”一边实践一边学习的老顾,很快在新的领域大展拳脚。

他印象最深的一次调解,是2015年的一起意外伤害事件。在这起事件中,张某受舅舅雇用,在一家工厂工作,不慎被起重机械压成植物人。当时,医药费已花去60多万元,张某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悲痛欲绝,今后怎么办、谁



顾仁良(左一)指导调解双方签订调解协议。

资料照片

来赔偿,几方争吵不休,事情越闹越大。

老顾接手后,先是从“法”的层面进行梳理。他弄清楚了责任,张某舅舅并无资质,所以工厂转租合同无效。工厂与张某舅舅都有责任,各赔一半。随后,老顾对理赔费进行调解,前后数轮,最终达成200余万元的大额理赔协议,尽可能做到了合法、合情、合理。

亭林镇司法所所长陈坚告诉记者,多年来,老顾带领团队形成了亭林镇“三个三”人民调解工作法,“三个服务”,即服务群众、服务企业、服务村居;“三个原则”,即依法调解、自愿调解、平

等调解。“三个一样”,即干部和群众一个样,熟人和陌生人一个样,本地人和外地人一个样。对于这些原则和方法,老顾坚持一丝不苟地执行,甚至还因为“铁面无私”得罪了不少人。

“访调对接”,化矛盾于无形

在老顾看来,能不能当好一名人民调解员,关键在于能否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。

“把调解工作做好了,可以为老百姓解决难事,可以让当事双方减少打官司等成本,可以减少信访工作量,为地区稳定筑起第一道防

线。”顾仁良坦言,亭林镇是一个大镇,各种类型矛盾纠纷层出不穷,到镇里人民调解窗口来的,要么是难事,要么是村居无法解决的,要么是突发的矛盾,自己和团队工作人员必须热情接待,以高度的责任感投身到调解工作中去。

2015年,亭林镇成立金山区首家访调对接工作室,人民调解与信访联动对接工作机制正式形成,并逐步推进、深化。这当中,顾仁良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。他认为,用调处手段化解为符合条件的信访事项提供了解决矛盾的新途径,拓展了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,能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为此,他经常去镇信访部门查询相关信息,分析资料,对不稳定因素进行研判,力求将调解与信访进行优势互补,助力矛盾纠纷化解。

一边“充电”,一边当好“导师”

“顾老师在调解工作中,说话特别有感染力,而且对不同情况有不同办法……”这是许多当事人的直观感受。对此,老顾坦言,自己只有小学文化水平,最初在合同纠纷调解等方面也是门外汉,因此必须不断地学习“充电”,看书、看报、看电视,并向身边同事学习。同时,老顾还收集法制类报刊上的调解案例,以便在自己的日常工作有所借鉴。

要推广深化人民调解工作机制,还要通过教育培训,培养出更多年轻优秀的人民调解员,做好人民调解的“导师”。顾仁良总结多年的调解经验与技巧——用公心、真心和爱心调解。几年来,在老顾的精心培养下,一批批调解员迅速成长起来,一个个调解能手脱颖而出,其中最年轻的才30岁。而老顾总谦虚地对学生们说:“我们是相互学习、共同成长。”

滨江岸线歌声连成片

快闪MV今晚首播,《航拍上海·徐汇篇》明晚首播

本报讯 近日,在西岸龙美术馆广场举行的一场快闪活动,吸引了千余名市民和游客参与。江畔江上水陆相应,国旗飘扬,歌声连成一片。

“我和我的祖国,一刻也不能分割……”天籁般的童声响起,人们循声张望,惊喜接踵而至: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方琼、主持人夏磊、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珮瑜、篮球运动员刘炜,四张熟悉的面孔在人群中出现,与上海师范大学合唱团、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、徐汇区爱菊小学童声合唱团、全国劳模、中科院院士,以及徐汇区的先进代表等共同唱起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“东南有胜地,自古多繁华,海上庆升平,开国万民欢”,王珮瑜的四句京剧念白,道出了人们的心声。

岸边歌声回荡,江上,悬挂着五星红旗的“新友好”号游轮徐徐驶来,船上岸上的人们挥舞着国旗彼此呼应。一曲终了,一面巨幅五星红旗从滨江高高的橙色塔吊上迎风展开,再次引发人们的欢呼。“从徐汇区的变化,从我们滨江的变化,看到伟大祖国70年的变化。”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团长成泉木激动地说。

快闪活动由中共徐汇区委、徐汇区政府主办,快闪MV今晚在东方卫视《东方新闻》首播,《航拍上海·徐汇篇》将于明晚首播。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上海各区快闪MV展播活动由市委宣传部、市委网信办、市政府新闻办共同主办,上海广播电视台、上海报业集团、东方网承办,各区展播片将在东方卫视等本市主流媒体播放,展播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0月。



市民和游客在快闪活动中高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

资料照片

上万驻沪官兵参赛“双拥杯”

本报讯(记者 秦东颖)以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强身健军”为主题的2019年上海市业余联赛第十一届“双拥杯”驻沪部队军民健身系列赛昨天落下帷幕。从第一届仅3支驻沪部队参与,到今年有14支驻沪部队的上万官兵参赛,人数创历史新高。

本次比赛除保留篮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等8个民众喜爱的传统项目外,新增了“跑步射击联项”等具有部队特性的运动项目,拉近部队与民众的关系,也丰富了比赛形式。军地之间在文体方面的联欢、联谊活动,一直是上海双拥工作中军民共建、共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双拥杯”驻沪部队健身系列赛作为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的品牌特色项目,已经进入第十一个年头,对活跃驻沪部队军营体育文化生活、促进部队体育健身活动、增进军民鱼水情谊起到了积极作用。